学术动态

西方义和团研究的新趋势
——评《拳民、中国与世界》

姚　斌

一

110 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想象中，义和团形象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义和团运动所特有的“戏剧色彩”，以及义和团战争在 19、20 世纪之交给全世界带去的巨大冲击波，使得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西方媒体的字里行间不时感受到它的影响。不过，大多数西方媒体及其所体现的大众想象都常常将义和团简化为漫画式的、极端排外的狂热分子。

而在西方学术界则一直存在着探究义和团史实、澄清意识形态迷雾的趋势。义和团研究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义和团研究的兴趣有增无减。从早期的乔治·史泰格、谭春霖、维克多·伯赛尔到后来的周锡瑞、何伟亚、柯文等学者，他们不仅推进了对义和团的史学研究，而且一直维持着西方学界对义和团研究的兴趣。

进入 21 世纪，西方的义和团研究仍在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垦拓。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孔正滔教授在总结当代西方义和团研究特点时指出：对义和团时期暴力行为的研究、对媒体史的关注，以及义和团事件的跨国影响研究是义和团研究的三大趋势。这三大趋势在 2007 年出版的《拳民、中国与世界》一书收录的论文中得到相对集中的体现，我们有必要简要介绍该论文集的主要内容、观点与材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照。

二

《拳民、中国与世界》共收录 10 篇论文，由罗伯特·比格斯和狄德满共同主编。[①] 依据其研究对象，这 10 篇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包括山西、内蒙等地的活动及其地域特征；第二、联军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抢掠行为及其所引发的道德辩论，包括对天津联合政府的研究；第三、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与反应。当然以上分类只是依据文章主要内容，有时一篇论文可能会涵盖几类研究对象。

罗伯特·比格斯为论文集撰写了长篇序言，不仅概述了集中收录论文的主要观点，而且还阐述了义和团运动的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说，该序言也是论文集的有机组成部分。比格斯指出，论文集打破了以往将义和团运动简单视为传统保守势力向现代文明挑战的论断，而将义和团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上，与同时代的反殖民潮流相联系，将其视为反抗全球化浪潮的“彻头彻尾的现代式反

[收稿日期] 2011 - 10 - 15
[作者简介] 姚斌（1979—），男，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北京 100089

抗”，“体现了现代中国和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新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诸多事件、人物和行为的评价自然会随之发生变化。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我们将在论文集中看到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反应依据其文化背景、自身状态和国际战略而不尽相同。而对义和团运动在国内的发展演变，论文集强调它是由一系列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地方性事件所构成的。它既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权力结构等相联系，又离不开局部地区在中西互动条件下的具体特征。

可以说，“地方性、全国性和世界性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都交织在了一起”[②]。义和团运动，尤其是作为运动高潮部分的义和团战争，在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事件。比格斯指出，理解世界历史必须要理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而义和团对于西方人理解中国有着重要意义。正如他在序言总结部分所述“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1899—1900年的世界历史中，它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争论的焦点。理解义和团运动有助于我们理解1900年前后的世界，了解这一时代的技术水平、意识形态和暴力行为，以及一场发源于中国北方农村的农民运动如何成为全世界各国报纸、政府和公众热烈辩论的话题。”[③]

三

论文集中关注义和团活动地域特征的主要是沈艾娣《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山西中部的义和团运动》、狄德满《教会军：华北教徒与拳民的武装冲突》以及罗杰·汤普孙《报道太原屠杀：1900年中国战争中的文化与政治》等三篇论文。

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周锡瑞着眼于山东，着重分析了鲁西北地区的特殊地域特征、文化传统与义和团运动起源的关系。而柯文和罗杰·汤普孙都曾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暴力行为主要源自村庄内部的民教冲突。沈艾娣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上述研究者的一种挑战。她认为，周锡瑞聚焦山东一地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为何山东以外其他地区的年轻人那样热烈地欢迎和接受拳民的活动，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何义和团运动得到众多地方精英的支持。因此她将关注点转到山西，研究山西出现的暴力行为的根源与模式。而对于柯文和汤普孙的观点，她则认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山西中部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由于不同村庄之间的暴力斗争，而不是因为村庄内部的民教斗争。

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沈艾娣展开了对村庄和村民共同体之间权力关系的研究。她在研究中发现，山西中部拳民暴力的矛头所向通常是整个村庄。当时的本地人、官员和外国人也都认为战斗发生在村庄之间。她据此断言“暴力的模式体现了既有的村庄间权力结构。”[④]所谓的“村庄间权力结构”主要是指围绕晋河灌溉体系形成的地方权力关系机制。她认为受到拳民攻击的村庄往往不仅是因为有教民，而且是因为他们控制了灌溉体系。因此拳民发起攻击性的暴力行为并不仅仅由于人们一般认为的民教冲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地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

汤普孙关注的地域仍在山西，但他的研究重点是毓贤。他对毓贤的“屠夫”形象提出质疑。他认为毓贤在山西的屠杀行为是在特殊条件下对特殊形势的反应。1900年6、7月间，身为山西巡抚的毓贤面临着严重的地方性动乱，他收到大量来自山西各地以及内蒙古地区有关民教冲突的报告。他所在的太原城内人心惶惶，流传着不少关于教民即将组织攻城的消息。汤普孙从当时的记载中发现，地处太原的巡抚衙门在7月曾多次成为聚众闹事的对象。由此他推论说“是聚众闹事者的暴力，而非毓贤，直接导致了太原屠杀事件。”[⑤]

汤普孙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在毓贤看来，当时的中国与外国是处在战争状态。天津和北京都面临着联军入侵的威胁，清廷已然向各国正式宣战，而毓贤职责所在是全力支持中央政府的决定，向传说中正在组织和策划暴乱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发起攻击，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而非纯粹的排外举动。因此他的行为应该置于“1900年的中国战争，而非拳民起义”的背景下解释。

与沈艾娣和汤普孙的“中国视角”不同，狄德满的研究出发点是西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论文也与此有关，研究的是华北地区教会军（Church Militants）问题。他指出，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义和团运动期间教民遭受的伤害和损失，却忽视了华北不少农村地区的教民成功抵抗拳民攻击的事实。而教民的成功抵抗主要依赖的是教会军组织。

狄德满认为，教会军组织的发展是与华北平原的集体暴力传统相联系的。天主教长期以来已经融入到动荡的华北农村环境中。传教士在教会军组织中扮演的领袖角色与中国农村乡绅的角色非常类似。狄德满为此借鉴了施坚雅和裴宜理的相关研究。裴宜理曾指出在中国华北地区由于资源匮乏，天灾频仍，当地人倾向于采取“掠夺性策略”。在这样的环境里，争斗成为生活的方式。由此，狄德满认为，在不少地区，反教的集体暴力行为其实往往都是既有争斗的延续，而宗教因素只是加剧了竞争。甲午战后，传教势力增强，不少中国教民试图利用西方传教士的势力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取得竞争中更加有利的地位。

1900 年春夏，拳民势力大盛时，教会教民遭受了相当大的人身与财产损失，但是在鲁西北、豫北、直隶、山西和内蒙的一些教会军的据点却成功地抵抗了拳民的攻击。狄德满在具体研究几处这样的据点时还发现由于拳民对据点久攻不下，开始向非教民索取粮食，甚至绑架勒索。于是非教民组织的乡团把守村庄入口，在客观上保护了教民。

狄德满所关注的另一大问题就是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在此，他的对话对象是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周强调传教士活动与帝国主义扩张结伴而来，尤其是在 1897 年德国攫取胶州湾之后，传教活动也进一步加强，从而激化了山东地区早已存在的民教矛盾。而狄德满则认为虽然传教士的势力和特权来自中外条约，但却不能说明传教士和帝国势力之间一定存在结伴共谋的关系。他以德国圣言会为例试图说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例如圣言会主要汇报的对象是梵蒂冈教会，而非柏林政府。因此，很难说他们的行为是直接与帝国扩张相联系的。不过他也指出，在义和团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教会与帝国主义势力在一些地区显然有过更加紧密的合作。

对山西和内蒙的情况，狄德满也做了简单研究。他指出山西虽然没有暴力文化传统，但当地教民同样在传教士的领导下组织了比较有力的反抗。而在内蒙，新的定居者之间，以及新定居者和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暴力斗争，但教民的武力反抗同样是在外国传教士的领导下展开的。因此，在环境和社会结构不尽相同的地域，教会军的核心领导都是天主教牧师，他们在当地社会结构中扮演了领袖角色。

狄德满重在说明的是，外国传教士及其领导下的教会军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中，但由于外国势力的加入，不仅使得原先的传统与结构变得更为复杂，而且也推动着华北农村权力分配机制及合作、竞争模式的悄然变化。

四

论文集中另有三篇文章讨论由义和团战争后外国联军在华抢掠所导致的道德辩论，以及天津临时政府的活动，即：何伟亚《抢掠及其批判：道德话语和北京大抢掠，1900—1901》、本·米德顿《帝国的丑闻：华北的抢掠和日本的公共空间》和刘易斯·伯恩斯坦《沦陷之后：外国占领下的天津，1900—1902》。

何伟亚在研究中发现，义和团战后侵华联军残杀中国平民的事实大多被西方公众忽视，唯独联军对中国皇宫、王府和平民实施的抢劫却遭到不少道义质疑。侵华联军的抢掠几乎是与使馆解围同时，持续数月之久，其规模和强度都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联军的行为在国内引发了强烈质疑，质疑此番军事行动的真实目的。对于多数欧美人来说，派遣联军去中国采用武力手段解救被围困的外交人质在道义和政治上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在解围之后联军对京津地区实施的大范围抢掠却与他们的“文明观”相悖。他们认为，抢掠行为不仅有悖于军队前去解救人质的初衷，也有悖于道德和

法律的原则。[⑥]

何伟亚介绍了英、法、美、德等国舆论对抢掠行为的指责和道义批判。他指出，与抢掠自其他殖民地的战利品一样，1900 年的“中国战利品”同样不问来源地被收藏在各国的博物馆中。而西方和日本等国并没有认真对待抢掠来的战利品问题，它们往往忽视或是忘记其来历。他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抢掠问题，西方和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直受到影响，直到有一天能够找到一种公平方式消除过去战争带来的创伤。

可以看出，何伟亚从后殖民研究的视角出发，不仅指出了抢掠行为在当时所招致的道义批判，同时也强调了殖民历史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西方殖民主义大扩张时代，非西方为西方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精神与物质代价。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随着国家之间公正、平等原则的逐步确立，西方有必要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行动维护人类社会的团结与繁荣。

与何伟亚的关注点类似，米德顿探讨了日军在华北的抢掠行为在国内舆论界激发的反响。在义和团运动初期，日本媒体曾大力呼吁政府派遣军队参与联军对华作战，认为这是日本实现其文明化使命的良机。但在日本派兵参与联军侵华后不久，日本媒体从现场传来的消息中发现联军的目标已经不仅局限于平息义和团，而是向全中国人民开战。特别是在了解到日本军队参与联军抢掠的行为后，日本媒体对义和团战争的支持转为批判，并最终在当时日本国内的流行报纸《万朝报》有关日本军队参与抢掠的系列报道中将批判推向高潮。

《万朝报》的报道引发了强烈的公众反应。《万朝报》不仅点名道姓地指出参与抢掠的高级军官，还事无巨细地翻出了日本官兵抢掠来的战利品清单，追踪其下落。在有关讨论中，道德是突出焦点。与众多欧美媒体一样，《万朝报》所关注的也是文明国家的“野蛮行为”问题，重在厘清文明与野蛮的界限。

不过米德顿也提请读者注意，所有相关报道的矛头指向都是日本军人个体的野蛮和不道德行为，而非军队本身，而且也没有任何文章质疑日本军队在义和团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他认为，《万朝报》揭露抢掠丑闻的最终目的是为“重塑日本军人的荣誉”，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而且“抢掠丑闻既没有带来对军队内部腐败分子的大清洗，也没有导致对国家与军队关系的修正”[⑦]，所以该事件不仅体现了日本公共领域对抢掠行为的道义批判，更是对军队逐渐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趋势的担忧。这一现象在后来的军国主义日本愈演愈烈，直至二次大战期间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伤害。

米德顿的研究说明，义和团及其后续事件在日本国内造成了很大影响，义和团战争期间日本军方的表现使得国家与军队关系中的问题暴露出来，也使得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受到反帝团体的激烈挑战，甚至日本在野党的反对政治也受到很大影响。

刘易斯·伯恩斯坦研究的天津临时政府也体现了义和团运动的后续影响。不过他更多关注的是西方国家的“文明”面。义和团战争后由联军组成的临时政府管理天津两年有余。伯恩斯坦依据时人记录，如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田贝的《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等，描述了临时政府的活动。他试图说明，虽然义和团的威胁消除之后，联军之间的团结不再，相互的明争暗斗增加，但由各国代表组成的军事化管理的临时政府还是在天津开展了大量建设性活动。他主要列举了临时政府所做的五大方面工作，即：财政、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市政建设、社会福利等。他指出，“尽管处在混乱的环境中，但天津临时政府不仅存在了下来，而且还改变了城市的整个面貌”[⑧]。

在论文的后半部分，伯恩斯坦还介绍了一些对临时政府工作成败的评价。西方评论人士，如明恩溥、田贝、康达米少校等都对临时政府大加称赞。但他也认为，由于这些评价是从帝国主义者角度出发的，因此不能代表中国人的观点。临时政府“做了它必须做的工作，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做或爱做，而是因为这些措施对他们共同的身体健康和福祉有益，而且会不顾本地人的意愿一定要做成”[⑨]。

五

论文集中专论义和团运动跨国影响的有三篇文章，分别是：T·G·奥特《拳民起义与英国外交政策：孤立主义政策的终结》、C·A·贝里《拳民起义和印度：全球化的迷思》以及杨雅南《庶民眼中的拳民：一位印度士兵对中国与世界的描述，1900—1901》。

英国学者奥特研究的出发点是义和团事件“不仅是晚清历史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世纪之交英国外交政策的分水岭”[⑩]。为说明这一观点，他考察了19世纪末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研究义和团事件如何导致“孤立主义”外交战略受到挑战，从而产生调整变化。

奥特指出，19世纪末叶，以索尔兹伯理为首相的英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仍然遵循“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然而，义和团事件的爆发让英国政府的决策层措手不及。他认为英国政府对义和团事件的决策基本上是被动反应式的，因为直到1900年5月，英国政府还认为，正在发生的义和团排外运动不过是零散的地方性群众运动，与1890年代常见的其他排外事件并无区别。进入6月，西方使馆被围攻、外交官危在旦夕、中国政府向各国宣战的消息传来，英国政府和媒体的目光迅速从鏖战正酣的南非布尔战争转向中国的义和团战争，尤其是被围困的外交使节的遭遇。此时，认为只要采用恫吓手段就可以平息动乱的态度开始松动，部分议员公开呼吁采取军事行动，向中国派遣援军。

奥特指出，当时的英国政府决策层在对待义和团战争的问题上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索尔兹伯理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主张不采取对华军事行动；而另一派则为增兵派，主张放弃“孤立主义”，与德、俄、日等国结盟。在反对派的强大攻势下，索尔兹伯理最终在增兵和结盟问题上做出妥协，这一政策让步也成为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改变之滥觞。而这一政策变化的触媒恰是义和团事件的刺激。可以说，对义和团事件的政策应对过程，‘标志着英国寻求摆脱国际孤立的缓慢进程的开始”[⑪]。因此，1900年有关义和团事件的外交政策辩论其实是与英国政治理念中有关帝国和国际政治更大的范式转换相联系的。

印度史专家贝里主要研究的是印度知识精英阶层对义和团事件的反应。印度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仍处在印度总督英国人寇松的铁腕控制之下。但自19世纪末期以来，印度社会底层的反抗情绪已然抬头。贝里指出到1900年左右时，印度中产阶级与英国政府和西方模式之间的隔阂已经外显，他们对英国的帝国政策更多抱持批判态度。

当时印度知识阶层的普遍共识体现在印度媒体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义和团运动的消息传到印度，印度媒体将义和团作为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又一典型，据此展开对列强的批判和表示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当时的印度媒体中有很多关于布尔战争的讨论，它们常常将布尔战争和义和团运动联系起来评论。有份报纸甚至还引用一份出版于开罗的报纸说布尔人的将领表示欢迎义和团运动，因为运动是对他们争取独立斗争的支持。

但是，拳民自身的行为却又给印度报纸的编辑们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惑。印度的雇佣军参与了英国侵华部队，出于印度爱国主义宣传的需要，有些报道又宣扬印度军队对敌作战的英勇。而且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高涨，一直到使馆被围，文明与野蛮的话题纷纷出现在印度媒体中。虽然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鼓吹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然而在关于义和团的种种“野蛮”行为的消息传来时，不少印度知识阶层又开始担心这种以暴力为表现形式的民众性的宗教狂热会破坏底层民众的反抗运动。

由贝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底层民众运动的同情与担忧并存。那么印度的庶民阶层对于义和团又持何种态度？这正是美国学者杨雅南所要着力的话题。杨雅南研究的主要历史文献是一位作为英国雇佣军参加中国义和团战争的印度普通士兵辛格在战后留下的回忆录。回忆录题为《在中国的13个月》，小标题是《中国的战争》。[⑫]

在对辛格回忆录的研究中，杨雅南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一位印度的庶民是如何描述义和团运动的；其次是辛格的中国经历对他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了什么影响；再次是

辛格对联军抢掠的现场记录；最后是辛格所作的中印对比，中国与日本和欧洲的对比，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泛亚洲主义”思想。

杨雅南指出，这部回忆录之所以意义特殊，是因为它是一位庶民用印地语写就的，讲述的是庶民的经历，且其读者也是庶民阶层和新兴的阅读阶层。辛格身为殖民地的庶民却参与了殖民者殖民中国的过程，其经历具有独特性。同时，辛格还受到印地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他对自身在义和团战争期间的经历描述，具有复杂的身份认同和视角。杨雅南分析了辛格的不同身份对他思想的影响。在辛格笔下，既有对他作为其中一员的英帝国的认同，也有对自己作为军人身份的认同，另外还有作为中国人的亚洲邻居所特有的认同。

杨雅南还特别指出从辛格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很多其他记述者笔下看不到的事实。例如列强的抢掠问题，在当时欧美国家作者的记载中，多数是相互指责，指责其他国家军队参与抢掠。而在辛格笔下，抢掠行为几乎是每个外国人都参与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说自己也参与了抢掠，但他提到印度土兵的参与。从辛格的描述中可以推断，当时的抢掠行为是在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发生的，包括像辛格这样的雇佣军也同样积极投身其中。不过正如杨雅南所评论的那样，辛格“感受到一种与‘中国敌人’相认同的‘亚洲亲情’”。他在字里行间表露出对无辜受害者的同情。

杨雅南从辛格的描述中推断出印度庶民阶层有关帝国主义和文明的看法。与印度的精英阶层类似，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反压迫斗争具有天然的同情，然而他们对于义和团的具体行为又都显示出不满。这既是由当时印度的殖民地地位所决定的，又体现了印度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

中国的义和团事件，不仅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心国家”造成深刻影响，而且也给当时的“边缘国家”带去冲击，说其影响遍及全球并不为过。

六

论文集中收录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柯文的《人化拳民》。与上述论文相比，柯文的视角有些不同。他所关注的对象是拳民本身，关注作为个体经历的拳民的感受和行为是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群有本质差异。他指出他所关注的“并非对西方（或日本）的去神话化，而是对拳民自身”。[13]

其实，此前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已经提出了一些想法，但是在此篇论文中，他比前者更加明确地提出拳民的“人性”问题。他还将此文收录在他 2003 年出版的学术自选集中，既是作为他对《历史三调》中一些观点的升华，也是对一些相关评论的回应。

柯文试图“人化”拳民的出发点是：在中国和西方，拳民的形象都被简单化和漫画化了。拳民形象成为意识形态操纵者和神话制造者的工具，已经不能体现拳民的本来面貌。因此，他的目标是对“拳民不做善恶判断，也不说他们是英雄还是野蛮人，而是将他们理解为人。他们面对着 19 世纪末华北平原出现的多重危机，其反应方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独特现象，而且与世界其他地区或其他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也非绝无仅有”[14]。

柯文力图从义和团运动发生当时的材料中找到拳民作为活生生的、有意识的人的存在证据。他尤其注重对义和团揭帖和口述记录的研究，试图还原当事人的心理和生理感受，从而实现“人化”的目标。

在论文中，柯文尝试从多个角度“人化”拳民。例如他强调，拳民的“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仪式并非独特奇异的现象，而是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类似现象相仿，都是人类在遭遇困境时的本能反应，因此拳民对现实的理解是非常合理的和人性化的。他相信：“拳民对所面临问题的回应其实与其他文化圈，包括欧美文化圈的人群在面临类似困境时的反应极其相似。”[15]

总体来说，柯文的努力可以概括为消除对拳民的漫画化，还他们以“人”的面貌。因此，他将关注重点集中在拳民的个体经验方面，包括“参与者的情感、动机、拳民和教民各自对 1900 年左右华北特殊环境的反应，以及他们如何建构各自的意义世界”等，并进而将拳民的个体经验置于全世界其他类似经

验中，“强调人类的共性，而弱化文化的特殊性”。[16]在论文的结尾，柯文也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最后的辩护，他指出他如此强调拳民的人类学共性并非否认他们的特殊性，而只是希望褪去之前人们对其“非人化”的例外主义的解读。

柯文“人化”拳民的努力是与更为广泛的“人化”历史的努力相联系的。当我们从历史的宏观看待历史中的个体时，我们往往只能用简单化和漫画化的方式去描述与概括，但如果我们深入历史的细部，深入到历史人物的个人情感和经历，我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于历史宏大叙事的微观世界。其实，不仅是柯文，论文集中收录的其他论文也都从特定的视角加入了这一努力。正是在跨国与跨时代的视角中，我们发现，“义和团”既非中国特有，也非特别暴力，其影响也绝非仅限于 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论文集撰写序言的罗伯特·比格斯才会强调，义和团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既是历史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问题。而只有当义和团运动的跨国与跨时代的影响通过研究全面厘清之后，义和团运动的深层意义庶几才能渐次浮出水面。

---

①这 10 篇论文曾在 2001 年 6 月 22—24 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的“1900：拳民、中国与世界”学术会议上宣读。会后经过 6 年修改酝酿最终得以出版。

②Robert Bickers，“Introduction”，in Robert Bickers and R. G. Tiedemann (ed.)，*Boxer*，*China and the World*，p. xii.

③Ibid，p. xxiv.

④Henrietta Harrison，“Village Politics and National Politics：The Boxer Movement in Central Shanxi”，in Robert Bickers and R. G. Tiedemann (ed.)，*Boxer*，*China and the World*，p. 8.

⑤Roger R. Thompson，“Reporting the Taiyuan Massacre：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a War of 1900”，in Robert Bickers and R. G. Tiedemann (ed.)，*Boxer*，*China and the World*，p. 79.

⑥例如，美国文学家马克·吐温就曾撰文严厉批判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参与抢掠的行为。当时不少美国报刊也指责抢掠行为是野蛮行为，不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⑦Ben Middleton，“Scandals of Empire：The Looting of North China and the Japanese Public Sphere”，in Robert Bickers and R. G. Tiedemann (ed.)，*Boxer*，*China and the World*，p. 127.

⑧Lewis Bernstein，“After the Fall：Tianjin under Foreign Occupation，1900—1902”，in Robert Bickers and R. G. Tiedemann (ed.)，*Boxer*，*China and the World*，p. 140.

⑨Ibid，p. 142.

⑩T. G. Otte，“The Boxer Uprising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The End of Isolation”，in Robert Bickers and R. G. Tiedemann (ed.)，*Boxer*，*China and the World*，p. 171.

⑪Ibid，p. 170.

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史学家丁则良早在建国初期就曾根据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主编的《新纪元》月刊的相关资料撰写了“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一文，初步介绍了辛格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尚小明、丁则勤编，《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⑬Paul A. Cohen，“Humanizing the Boxers”，in Robert Bickers and R. G. Tiedemann (ed.)，*Boxer*，*China and the World*，p. 194.

⑭Ibid，p. 182.

⑮Ibid，p. 190.

⑯Ibid，p. 194.